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十四卷第一期

2024 年 4 月 頁 111-154

DOI: 10.53106/222372402024041401003

研究紀要

社區能力建構之研究：由上而下與 由下而上不同觀點的比較

黃珮玲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石泐*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2 月 16 日。

* 通訊作者：stone@g2.usc.edu.tw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對於社區能力構面要素的看法,透過由上而下(公所承辦人員)和由下而上(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兩種觀點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鎖定「社區能力」包括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 8 個要素,以北部某縣市為研究場域,共回收問卷 516 份(公所承辦人員 258 份、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258 份)。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上有顯著差異。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發現,由上而下(公所承辦人員)和由下而上(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的社區能力構面在組成要素上有顯著不同,研究者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字：社區能力、社區發展協會、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A Study on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Views on Top-Down and Bottom-Up

Pei-Ling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Yang S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perspectives on th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apacity, comparing analyses from top-down (municipal staff) and bottom-up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viewpoints. The study focuses on eight elements of "community capacity," including project proposal writing, financial verification, community cohesion, commun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lerical administr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ource linkage, and local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within a certain county in northern Taiwan. A total of 516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258 from municipal staff and 258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bilities related to project proposal writing, financial verification, community cohesion, commun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linkag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community capacity dimensions between top-down (municipal staff) and bottom-up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ecutives) perspective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Community Capacity,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op-down, Bottom-up

壹、前言

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社發協會）是地方性的人民團體組織，是民主社會中非常重要的自發性團體，社發協會的福利服務輸送已成為政府不可獲缺的助手，尤其是近年來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趨勢下，社發協會不僅持續辦理老人福利服務，服務的類型也越發多樣性，例如長照 2.0 的巷弄長照站（C 據點），即多由社發協會所承辦。由此可見，社發協會與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其需要立基於在地需求，由下而上的發展在地福利服務，而社發協會能力的良窳則會影響服務的提供。

社發協會與在地區公所關係緊密，內政部於 1996 年頒訂〈加強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開啟福利社區化時代，「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3 條揭示鄉（鎮、市、區）公所為社區發展業務主管機關，第 6 條指出區公所「應輔導社區居民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依章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區公所需輔導社發協會來推動各項活動，亦兼具由上而下督導社區業務發展之責。

為有效推展社區福利服務，社區能力培植尤為重要，社發協會因具有人民自治團體的性質，並需要接受區公所的指導協助以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其在社區政策施政脈絡上似有其角色矛盾之處。過去對於社區能力的研究大多採用質化的途徑，透過訪問社區組織當中領袖人物或重要人士來瞭解他們的看法，如：呂詩婷、李固遠、謝奇明、蘇宜成、蔡必焜（2018）、陳巧倫（2019）、李易駿、鍾武中（2022），而透過量化的方式來探討社區能力的研究則不多見。職是之故，本研究希望透過量化資料的收集，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和由上而下（top-down）兩種不同的觀點來分析其對「社區能力」組成要素的看法，

並比較這兩個不同觀點的差異，期能瞭解不同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是否存在差異，以提供政府部門在未來進行社區組織培力與輔導上之政策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組織

社區組織可作為居民規律性互動的場域。社區是由一群人組成的集合體，其構成元素包含地方區域、社會組織、以及基於共同利益事件的社會互動（Green and Haines, 2015）。社區組織演進過程中常與社區發展息息相關。所謂社區發展是指社區居民透過自身努力與彼此合作，回應在地需求、反映社會結構的困境，加上政府當局的協力，以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問題（吳明儒，2009；李易駿，2021）。由此可見，社區發展是一個長遠的歷程，透過激發社區組織的潛力與教育過程，增進社區居民的凝聚力並提升人民的福祉。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社區組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區組織會經歷潛力期、凝聚期、成熟期、管理期及轉換期五個不同的階段（Cameron et al., 2018），由於社區組織通常是透過民主制度的運作方式，因而其功能與發展常會隨著每個組織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然而，並非所有的社區組織都能成功達致轉換期，因此強化社區組織的能力就十分重要。

社區組織既是民主制度運作下的產物，組織的運作是否健全就很重要，社區組織運作的核心元素包括組織、發展、計劃、改變（Itzhaky and Bustin, 2018）。完備的社區組織應具備四個要素，包括建立社區意識、社區成員間相互承諾、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外部資源的支持（Hockings, Stolton and Dudley, 2000）。在運作過程中，社區組織面臨的困境包含成員向心力不足、新舊成員間的意見

衝突，尤其是當地資源與人情世故的限制（Slavin, Terry Mizrahi and Morrison，2013），因而整合人力、資源和金錢是組織運作的主要挑戰。

二、社區能力

（一）社區能力的意涵

「社區能力」是社區用以解決問題、促進社區福祉、達成社區願景與永續發展的能力。不同學者對社區能力的定義有所差異，但皆強調社區能力包含社區的承諾、資源、技術的整合，社區內有形無形資本間與資源的互動，以建構社區優勢來解決社區問題（Mayer，1994；Chaskin，2001；Laverack，2006；Rubin and Rubin，2008）。從過程和內容的雙重角度來看，社區能力是提升居民參與及實踐社區福祉的行動歷程，使社區動員去實踐、解決及滿足社區居民的問題與需求，以提供較好的在地性服務，穩定居住環境或提升社區經濟福祉，同時又能有效的藉由某種程度達到社會互動關係，促進社區的永續發展（賴兩陽，2013；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5；梁大慶，2016、2017；李易駿，2021）。

（二）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

社區能力包含社區集體能力及社區組織能力兩個層次，社區集體能力通常與在地系統、制度及政治角力因素有關，其內涵包括社區中所存在的人口特質、網絡、服務、制度、知識及互動關係（Simmons, Reynolds and Swinburn，2011；劉素珍，2013）；而社區組織能力則是一組有助於組織使命實踐的特質及技能，用以促使組織發展、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務及提高工作成效（Eisinger，2002；Andersson, Faulk and Stewart，2016；Sun and Asencio，2019），其通常涉及組織本身內部運作及管理能力，包含組織成員能力、組織文化、對組織目標的認

同、溝通管理模式及組織對外關係等因素（Walters，2021；黃源協、莊俐昕，2020）。社區組織能力也包括財務募款、組織溝通、決策、人力資本、組織運作、行政管理、政治網絡等能力（Lee and Clerkin，2017；Wells, Jones and Norris，2020）。

社區能力的組成要素有多種分類方式，包含資源能力、組織能力、方案規劃能力、網絡與政治能力等面向（Glickman and Servon，1998）；或是參與、領導、組織結構、問題預估、資源動員、實事求是、人際網絡連結、外部資源連結、方案管理等九個要素（Laverack and Labonte，2000）；以及網絡夥伴關係、知識轉移、問題解決、基礎能力／建設（Bush, Dower and Mutch，2002）；還有社區組織穩定度（有能力長期進行服務輸送）、財務穩定度（現金流及資金管控能力）、服務品質穩定度（產生長期的服務效益）、社區組織成長穩定度（組織服務及方案項目的擴展）（Blumenthal，2003）。Hargreaves 等（2017）將社區能力區分為聯盟能力、網絡能力、以社區為中心的問題解決能力、擴大社區的影響力四個層級；Kim, Lee, Cho, Lee, Park and Cho（2020）將社區能力分成內部（社區居民參與度、領導力、連結力、觀感）與外部能力（組織及資源連結）。由此可知，社區能力有不同的區分方式，其將影響社區培力扶植的重點和方向。

（三）社區能力的培力面向

在實務工作中，社區能力的培植是社區輔導的首要之務，也是決定社區服務方案能否發展的主因（黃肇新、邱靖媛、朱洪漢，2009；許雅惠，2011；李易駿，2021）。社區能力培植對於社區問題解決和資源連結具有重要的影響，能在規劃與執行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藉由連結取得外部資源來協助社區的發展和進步（Chaskin, Brown, Venkatesh, Vidal and Chaskin，2001）。為了回應社區能力的發展需求，社區工作方法已逐漸轉變為瞭解社區組織所擁有的優勢

與資源，此一「能力、資產」的觀點強調從發掘社區能力和資產著手，以培植社區組織互惠及互助的能力為目標（Kretzmann and McKinght，1993；Harrison, Blickem, Lamb, Kirk and Vassilev，2019；李易駿，2021）。

賴兩陽（2020）從實務運作上建議社區應該提高其文書處理、開會議事、志工管理、方案執行、資訊運用、創新及訂定願景等能力；許雅惠（2011）認為社區能力的提升，除了包括社區組織發展力的提升，更以社區居民能力的提升為基礎，且有賴社區專業工作者的居間促進。一個能力成熟的社區組織，其在地關係網絡、服務的多樣性及複雜性都會增加，組織的資源連結及動員力也會提高，服務品質及服務效益也較好，社區服務常能多元性的發展，因此居民能同時運用機會及挑戰來辨識社區需求及資產，並且設定社區發展的共同目標、排定優先順序、發展出集體行動策略並持續執行，最後能監控社區改變的成效（Weil，1996；Bowen, Martin, Mancini and Nelson，2000；Austin, Regan, Samples, Schwartz and Carnochan，2011；Andersson et al.，2016）。

在衛生福利部（2021）出版的〈社區培力中心實務操作手冊〉中，將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行政能力培養、人力資源管理、社區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列為社區輔導的重點工作，此亦可做為評估一個社區能力的指標。

（四）社區能力的測量

社區能力的測量主要是在衡量社區發展程度及知識網絡、技能和資源擴展的狀態，它同時也被認為是在社區發展的各個階段中，用以評估社區中各種關係及網絡建構的狀態（Israel, Schulz, Parker and Becker，2001）。過去對於社區能力的測量大多參考 Glickman and Servon（1998）的社區能力分類方式，從資源、組織、方案規劃、網絡與政治五個面向來衡量社區能力；此外尚有以下幾種測量面向，包括活動辦理、參與人力、策劃人力、文書能力、經費來源與活

動場地（賴兩陽，2013），或從社區靜態能力（關係力、人資力、財物力、環境力、文化力）與動態能力（參與力、連結力、領導力、組織力）來加以測量（劉素珍，2013），也有根據社區所具備的組織力、執行力、導入力、凝聚力與永續力（梁大慶，2016），或是社區組織成員的分工及投入狀態、對在地需求敏感度、發展方案能力等來作為衡量社區能力的實務指標（Andersson et al., 2016；Walters, 2021；黃珮玲，2021）。

除此之外，Walters（2021）將社區能力內涵區分如表 1，Walters 認為社區能力優劣除了領導者本身的能力外，還與成員對組織使命的認同密切相關，形成組織核心能力，驅使組織深入瞭解服務對象需求，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來解決社區問題。綜合前述不同學者與衛生福利部（2021）的指標，本研究將社區能力區分為人力資源管理、方案規劃設計、社區意識凝聚、行政文書處理、財務核銷等能力、社區產業鏈結、在地資源整合、在地組織協調等八個項目，並以此作為本研究評估社區能力的參考依據。

表 1：社區能力領域及實際工作內涵

社區能力領域	實際工作內涵
組織規劃能力	將使命、願景、策略的實踐落實於平日規劃
領導力	使每個人都可以投注於使命實踐
方案規劃力	設計、管理及評估服務
募款能力	募集金錢及實物捐款活動
社區夥伴關係維繫	連結與實踐使命有關之團體及志工
財務及責信管理	管理財務及展現責信能力
溝通能力	與所有的內部組織成員及外部單位溝通

資料來源：Walters（2021），作者整理。

三、（鄉鎮區）公所與社區組織發展

由於施政方針的不同，政府與社區組織間存在不同角力關係。賴兩陽（2021：85-87）從「政府介入」程度，將政府－社區關係由弱至強分成四種：1.烏托邦社區工作，社區完全自主；2.自我治理社區工作，藉著公民參與機制、社區與政府間共享價值與資源；3.行政導向社區工作，政府以政策及資源引導社區組織、發展符合施政期待的業務；及4.黨國控制社區工作，社區組織完全配合政府命令。在地方政府的組織系統中，（鄉鎮區）公所為基層官僚組織，提供居民服務、管理施政預算，其雖隸屬於民政體系，但常與社政系統息息相關，以發展符合社區需要之社區福利服務工作，同時也是社區組織最常觸及的政府單位（葉明勳、劉坤億，2012；孫煒，2020；紀和均，2021）。公所與社區組織間若常互動和交流，則社區組織對公所會存有信任與依賴的關係，但公所扮演社區組織計畫案審查、管控核銷的角色，就資源分配及審核角度而言，公所成為資源守門員角色，與社區組織形成了上對下的關係。

在現今施政脈絡下，欠缺經費及動力不足常導致社區自主性無法發展（謝政勳、邱鈺婷，2023），此往往加深社區組織對政府的依賴，為實踐政府之社區政策，公所常扮演社區發展由上而下之在地推手。綜觀衛生福利部社區施政計畫，公所需積極陪伴社區組織進行計畫發想與提案，其對計畫孵育、執行及延續性有不可抹滅的正向助益，反之則難以為繼（李易駿、賴兩陽，2014；賴兩陽，2015；衛生福利部，2021）。以社區自主防災業務推動為例，常由公所主動串連在地網絡，以利在社區中推展（吳偉寧、謝政勳，2018）。但在是否要活絡在地發展上，公所常面臨公所人力短缺、無法切實輔導、社區提案動力不佳導致無人提案、跨局處提案考驗專業知能等困境（吳明儒、王仕圖，2009），因而公所雖欲扮演社區組織發展的重要推手，但也常遭遇到諸多的限制與困境。

四、臺灣社區發展協會的現況與困境

臺灣的社區工作很早就開始推動，目前社區工作主要是依據 1991 年所頒佈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依據該綱要，社區為推動各項事務必須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臺灣目前有 6,943 個社區發展協會，其中有成立社區生產建設基金的有 3,938 個、成立社區志願服務隊的有 4,511 隊、承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有 3,187 個（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22）。由此可知，社發協會不僅是人、錢和資源的集合，更是社會福利工作推動的基礎，其組織發展仰賴會員的積極投入，辦理公益事務以吸引在地居民投身於服務，也激勵非會員投入社區組織的相關事務，社區能力也同時得以發展成長（黃志隆，2020；李易駿，2021）。就需求而言，社發協會主要有設備設施、會務與財務、業務、人力四大需求（黃松林、黃怡慧，2015）；充足的志工、充足的經費、社區居民的向心力、發展跨部門與跨領域的合作機制等也是重要議題（賴兩陽，2013；王潔媛，2019）。就困境而言，綜合過去諸多學者的研究，臺灣社區工作及社發協會面臨以下多重困境（陶蕃瀛，1994；蔡吉源，1995；林勝義，1999；賴兩陽，2013；李美珍、王燕琴，2016）：

（一）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困境

- 1.政府指導與民眾參與不足：政府在社區發展中的角色應更積極，以促進有效的民眾參與。
- 2.政府指定項目與資源配置錯誤：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資源分配機制，確保資源能夠準確且合理地流向社區。
- 3.政府主責單位孤軍奮鬥：應強調政府、社區和相關組織之間的合作，建立協作機制，共同推動社區發展。

(二) 社區組織及領導力的困境

1. 社區區域太小、自主可能性太低：可提倡區域間合作，擴大社區自主發展的可能性。
2. 缺乏基層社區組織及基層領袖：宜鼓勵和支持基層社區組織的成立，培養領袖人才，提升社區自我管理的能力。

(三) 組織管理及執行力的困境

1. 行政主管單位多頭馬車：應強調組織協同作業，以減少多頭管理的混亂。
2. 組織動能及服務量能不一：宜加強組織動能，透過培訓和知識分享提高服務的品質和效能。
3. 組織幹部高齡化：未來應推動新一代領導人的培育，確保組織具有長遠的可持續性。

(四) 資源管理及財務透明度的困境

1. 經費的濫用及私人性質的活動：應建立更透明的經費使用機制，以防止經費濫用和確保資源有效利用。
2. 社區發展相關單位缺乏配合：建議能促進政府和相關組織的密切合作，形成有機的互助網絡，共同推動社區發展目標。

綜合上述，臺灣的社區工作似乎在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與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需求方式之間擺盪，社區組織既是民主制度下所產生的自主性團體，則應該有自己的需求和想法，但政府的扶植和培力又希望社區組織能具備相當的條件和能力，因而在政府單位和社區組織上常存在著期待落差。職是之故，本研究希望從政府部門（由上而下）和社區組織（由下而上）兩種不同人員的觀點進行比較分析，以瞭解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的看法。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目前社發協會的主管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公所的承辦人員是第一線與社區組織密切接觸的人員（衛生福利部，2021），公所社區業務承辦人員在社區培力上經常扮演監督的角色，而社發協會的理事長、總幹事和其他幹部則是第一線執行社區業務的工作人員，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狀況最為瞭解，故本研究將以這兩類人員做為研究對象，探討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兩種不同立場對社區能力建構上的差異。

本研究以北部某縣市為研究場域，該縣市公所與社區組織間有密切的往來和互動，故本研究擬以該縣市社發協會的幹部和公所社區業務承辦人員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社發協會的訪問對象包括理事長、總幹事、志工隊長或其他幹部，每個協會僅一位人員接受訪問，公所部分則由負責輔導該社區的承辦人員接受訪問，亦即每個社區有兩類人員接受問卷調查，調查工作於 2018 年 9 至 10 月進行，共完成 258 個社區、516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82.2%。

二、測量變項與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中「社區能力」包括方案計畫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社區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 8 個要素，詢問受訪者認為該社區在這 8 個指標上需要協助或輔導的程度，回答方式從非常不需要、不需要、普通、需要、非常需要各給予 1~5 分，分數愈高表示其認為該社區組織在此一指標上愈需要協助與扶植，並比較

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和社發協會幹部（由下而上）在不同指標上的差異情形，同時建構出社區能力的潛在構面，以比較這兩個構面是否具有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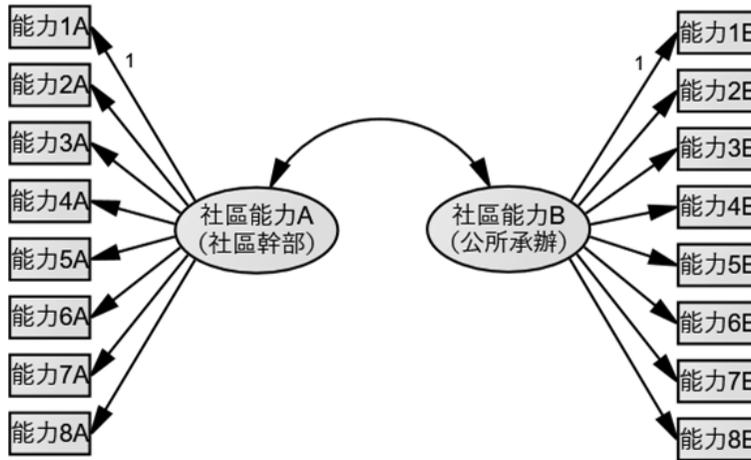


圖 1：研究架構圖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在組成要素上是否存在差異，以及這兩個潛在構面間是否具有恆等性，我們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進行資料分析處理，SEM 是一個結合了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的分析方法，其包含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兩個部分，主要目的在於檢驗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和外顯變項（manifest variable，又稱觀察變項）之間的關係，及數個潛在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在分析策略上，我們先依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分別建構兩個社區能力測量模型（社區能力 A、社區能力 B），再將這兩個潛在變項組成一個結構模型，藉以比較這兩個潛在變數間是否具有恆等性，統計分析方法包括

次數分配、獨立樣本 t 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並藉由 SPSS 25.0 及 AMOS 25.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肆、研究結果

一、社區能力需求的差異性比較

表 2 為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 8 個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首先，社區幹部認為最需要協助的社區能力依序為社區產業發展 (3.83)、資源連結 (3.70)、方案計畫書撰寫 (3.61)、文書行政 (3.43)、人力資源管理 (3.29)、財務核銷 (3.29)、社區意識凝結 (3.29)、在地組織協調 (3.26)；而公所承辦人員認為最需要協助的社區能力依序為財務核銷 (3.47)、社區意識凝結 (3.47)、在地組織協調 (3.42)、文書行政 (3.35)、方案計畫書撰寫 (3.33)、資源連結 (3.29)、人力資源管理 (3.19)、社區產業的發展 (2.69)。由此可見，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指標在排列順序上有很大的不同，社區幹部認為社區產業發展應該優先被重視，但公所承辦人員卻認為社區意識凝結應優先於其他的指標，而社區幹部認為在地組織協調能力最不需要，但公所承辦人員卻認為社區產業發展最不需要，顯見此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看法上並不一致。

進一步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來看這 8 個指標的差異，結果發現這兩類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 ($t = 2.809, p < .01$)、財務核銷 ($t = -1.969, p < .05$)、社區意識凝結 ($t = -2.017, p < .05$)、社區產業發展 ($t = 11.593, p < .001$)、資源連結 ($t = 4.688, p < .001$) 的看法上有顯著差異，其中社區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公所承辦人員，但在財務核銷、

社區意識凝結上則是公所承辦人員的平均得分高於社區幹部，由此可知這兩類人員對於不同的社區能力指標在重要性上有不同的比重。若進一步分析這五個指標的平均得分差異，差距最大的是社區產業發展（1.13），其次是資源連結（0.41）和方案計畫書撰寫（0.28）。另外在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在地組織協調這3個指標上，這兩類人員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2：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指標差異性比較

社區能力指標	身分別	平均數	標準差	<i>t</i>	平均差異	95% 差異數的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方案計畫書撰寫	A 社區幹部	3.61	1.23	2.809**	0.28	0.08	0.47
	B 公所承辦	3.33	1.02				
2.財務核銷能力	A 社區幹部	3.29	1.14	-1.969*	-0.18	-0.36	0.00
	B 公所承辦	3.47	0.90				
3.社區意識凝結	A 社區幹部	3.29	1.14	-2.017*	-0.18	-0.36	0.00
	B 公所承辦	3.47	0.89				
4.社區產業發展	A 社區幹部	3.83	1.11	11.593***	1.13	0.94	1.32
	B 公所承辦	2.69	1.11				
5.文書行政能力	A 社區幹部	3.43	1.15	.857	0.08	-0.10	0.26
	B 公所承辦	3.35	0.88				
6.人力資源管理	A 社區幹部	3.29	1.10	1.129	0.10	-0.07	0.28
	B 公所承辦	3.19	0.92				
7.資源連結能力	A 社區幹部	3.70	1.07	4.688***	0.41	0.24	0.58
	B 公所承辦	3.29	0.91				
8.在地組織協調	A 社區幹部	3.26	1.13	-1.770	-0.16	-0.34	0.02
	B 公所承辦	3.42	0.90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為建構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潛在構面，我們透過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從上述 8 個社區能力指標中分別建構出兩個社區能力測量模型，單因子 CFA 係指每一個潛在構面的測量變項只跟該構面有關、與其他構面無關，同時排除無關的測量變項。由於過去傳統檢定單一向度的方法是直接用 SPSS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將所有的測量變項用 EFA 進行因素分析，看轉軸後測量變項是否都屬於假設的構面之中，若在同一構面當中則符合單一向度原則，但 CFA 則是先考慮收斂效度、再考慮區別效度，可以提供較為嚴謹且比較準確的單一向度評估，亦即 CFA 可以同時提供相同構面當中內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的量化證據（張偉豪、鄭時宜，2012），故接下來將以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一）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在進行單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時，Fornell and Larcker(1981)、Hulland(1999)建議判斷標準為：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要大於 0.5；2.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要大於 0.7；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要大於 0.5。依據上述標準，本研究依這兩類不同人員先將 8 個社區能力指標繪成兩個一階 CFA，並依據張偉豪（2011）建議，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下的觀察變數，同時根據 AMOS 軟體所提供的殘差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 MI）進行模型修正，MI 值的判斷依據不同學者各有不同的建議水準，游錦雲等（2009）認為 MI 值設定為超過 10 以上就應進行修正，李茂能（2006）建議 MI 值高於 20 應進行處理，張偉豪（2011）認為 MI 值大於 50 應考慮修正。至於不良的題項處理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為將兩個題項的測量誤差以共變的方式呈現（梁世安、余國璋，2005），也就是在殘差之間

拉相關，但 Joreskog and Sorbom (1993)、Marsh and Hu (1996) 認為除非有理論依據或是變數間存在實質的關係，否則不應該假設殘差間具有相關性。第二種方式為刪除題項 (顏弘欽, 2013; 李琪明, 2020;)，通常會選擇 MI 值最高的題項刪除，並再重複此刪除過程，直到獲得良好的模型適配度為止 (姜淳方、李昀修, 2012)，而此種方法是較能建構出良好潛在構面的做法。本研究在測量模型的修正上依據張偉豪 (2011) 所建議的 MI 值 50 為刪除標準，並採用第二種刪除題項的做法進行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建構。

經由模型修正程序後，社區幹部所建構之社區能力模型中刪除指標 2 和指標 5，保留 6 個觀察變數，包括指標 1、3、4、6、7、8，該模型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SFL) 介於 .62 ~ .79 間，組成信度 (CR) 為 .86，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 為 .51，另外各觀察變數除了預設為 1 之外，其餘 5 個觀察變項均達到顯著水準。而在公所承辦人所建構的社區能力模型中，刪除指標 1、2、4，最終亦保留 5 個觀察變數，包括指標 3、5、6、7、8，模型的 SFL 介於 .69 ~ .88 間，CR 值為 .91，AVE 為 .67，各觀察變數扣除預設為 1 外均達到顯著水準 (詳如表 3)。

表 3：不同人員社區能力組成比較

群體	潛在構面	社區能力指標	Un Std.	<i>t</i>	SFL	SMC	CR	AVE
社區幹部	社區能力 A	能力 1A	1.00		.68	.46	.86	.51
		能力 3A	1.05	10.46***	.76	.58		
		能力 4A	0.83	8.76***	.62	.38		
		能力 6A	1.05	10.86***	.79	.63		
		能力 7A	0.87	9.35***	.67	.45		
		能力 8A	1.02	10.34***	.75	.57		
公所承辦	社區能力 B	能力 3B	1.00		.88	.77	.91	.67
		能力 5B	0.78	12.83***	.69	.48		
		能力 6B	1.04	19.17***	.88	.77		
		能力 7B	0.95	16.53***	.82	.67		
		能力 8B	0.93	16.28***	.81	.66		

在模型配適度檢驗上，檢驗結果如表 4 所示。在社區幹部所建立的社區能力 A 模型中，整體配適情形卡方值為 16.215， p 值大於 .05，接受虛無假設，由於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多寡的影響，故以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Normed Chi-square，NC 值）來判別，NC 值為 1.802，符合 Schumacker and Lomax（2004）小於 3 的標準。在絕對配適指標上，Henry and Stone（1994）認為 GFI 和 AGFI 理想要求標準應大於 .9，該模型分別為 .980 及 .952。RMR、RMSEA、SRMR 的檢驗上，Hu and Bentler（1999）、McDonald and Ho（2002）皆建議應小於 .08，該模型的值分別為 .035、.056、.029。在增值配適指標上，Schumacker and Lomax（2004）、Hu and Bentler（1999）認為 NFI、NNFI、CFI、IFI、RFI 值應大於 .9，該模型數值分別為 .974、.980、.988、.956、.988。在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 B 模型中，卡方值為 13.004， p 值小於 .05，拒絕虛無假設，同樣採用卡方與自由度比值來做比較，模型二中 NC 值為 2.601。在絕對配適指標上，GFI 和 AGFI 分別為 .980 及 .940，RMR、RMSEA、SRMR 值分別為 .016、.079、.020。在增值配適指標上，NFI、NNFI、CFI、IFI、RFI 值分別為 .985、.981、.990、.969、.990（詳如表 4）。

整體而言，經由模型修正後，社區能力 A 模型由 6 個觀察變數所組成（如圖 2），社區能力 B 模型由 5 個觀察變數組成（如圖 3），兩個模型在題目組成上略有不同，但經由配適度檢驗後，兩個模型在絕對配適指標和增值配適指標上均符合配適標準，是為信、效度良好的結構模型，可以進一步做分析比較。

表 4：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模型配適度檢定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社區能力 A	社區能力 B	恆等性模型	
絕對配適指標	χ^2	越小越好	16.215	13.004	68.677
	p	>.05	.063	.023	.008
	χ^2/df	1~3 之間	1.802	2.601	1.597
	GFI	> .9	.980	.980	.953
	AGFI	> .9	.952	.940	.929
	RMR	< .08	.035	.016	.036
	RMSEA	< .08	.056	.079	.048
	SRMR	< .08	.029	.020	.034
增值配適指標	NFI	> .9	.974	.985	.954
	NNFI	> .9	.980	.981	.977
	CFI	> .9	.988	.990	.982
	RFI	> .9	.956	.969	.942
	IFI	> .9	.988	.990	.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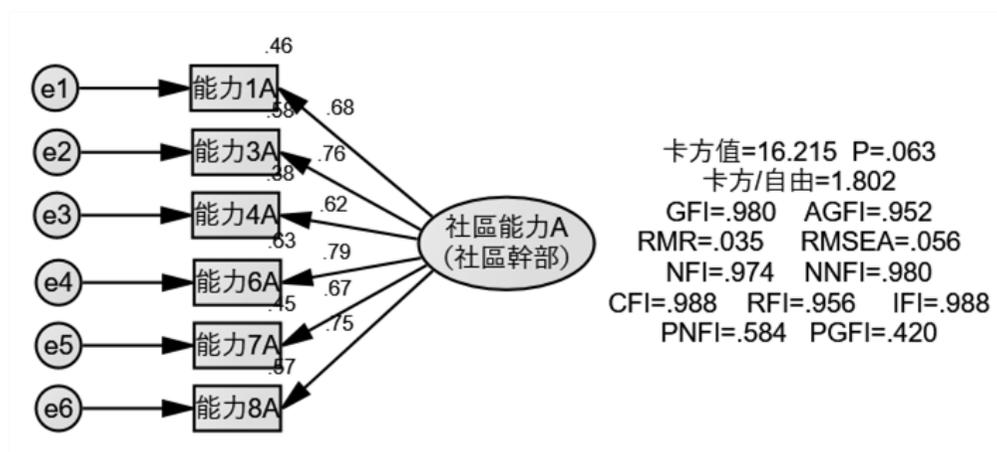


圖 2：社區能力 A 模型（社區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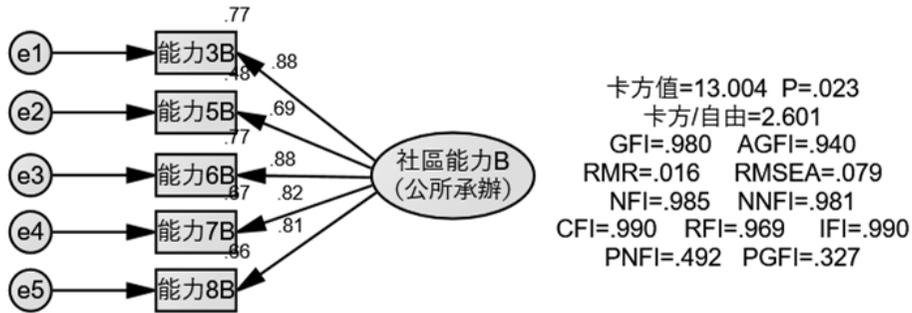


圖 3：社區能力 B 模型（公所承辦）

（二）不同人員社區能力潛在構面之模型恆等性檢驗

為瞭解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兩個社區能力模型是否相一致，我們藉由 SEM 當中的模型恆等性檢驗來瞭解這兩個模型是否相同，Drasgow（1987）認為模型恆等性（model equivalence）包括測量模型恆等和結構模型恆等兩種，前者是指觀察變數和潛在變數（構面）在各樣本群組間的恆等，後者是指潛在變數與潛在變數之間的恆等，本研究採用的是後者，也就是模型的關係恆等（relational equivalence），主要是比較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這兩個社區能力潛在構面是否相一致。根據 Horn and McArdle（1992）的說法，藉由因素結構恆等的檢驗，若兩個模型的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的基本結構關係對等，即可視為兩個模型的形態恆等。在檢驗方法上，我們首先將前述建構出的兩個單獨模型組合成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如圖 4），接下來進行模型配適度檢驗，由前述表 4 當中的模型三和圖 4 中可知，所建構的模型在絕對配適指標及增值配適指標上皆符合前述要求，進一步檢驗兩個潛在變數的相關情形可知， $r = -.184$ ($t = -2.542, p = .011$)，顯示這兩個模型達顯著差異並為負相關，即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模型不具有恆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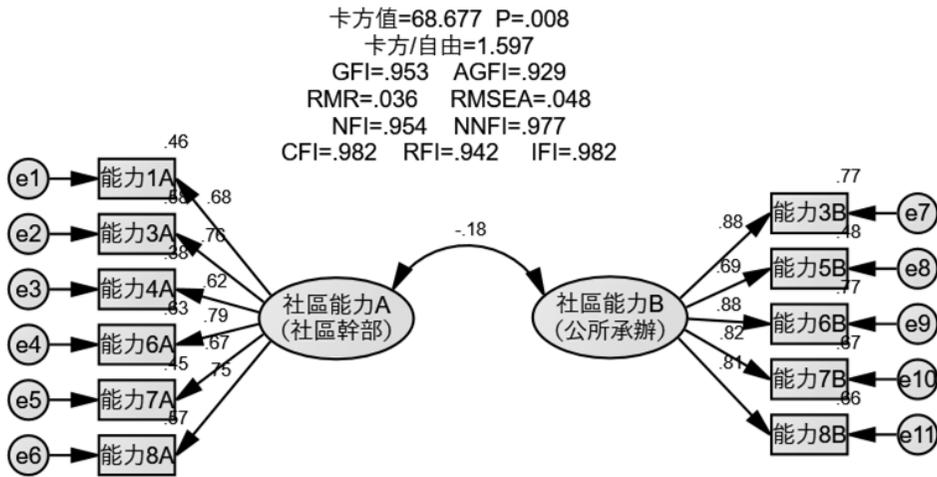


圖 4：社區能力模型三：恆等性模型

進一步我們把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潛在構面各項觀察變數予以累加平均，以獲得社區能力 A 和社區能力 B 兩個新變數，並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這兩個新變數是否存在差異，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5 所示。其中，社區幹部所建構的社區能力 A 平均得分為 3.50（標準差為 0.87），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 B 平均得分為 3.34（標準差為 0.77），兩組的平均數檢定結果 $t = 2.093$ ($p < .05$)，可知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新變數存在顯著的差異。換言之，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在組成要素上並不相同，而且其所建構出的單一社區能力經由統計檢定後也有顯著的差異。

表 5：不同人員社區能力之差異性比較

對象	潛在構面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i>t</i>	<i>p</i>	95% 差異數的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社區幹部	社區能力 A	258	1	5	3.50	0.87	2.093*	.037	0.01	0.29
公所承辦	社區能力 B	258	1	5	3.34	0.77				

* $p < .05$

三、討論

(一) 社區能力指標需求上的差異

就社區幹部而言，其認為最需要扶植的社區能力依序為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方案計畫書撰寫、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在地組織協調；就公所承辦人員而言，其認為最需要培力的社區能力依序為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在地組織協調、文書行政、方案計畫書撰寫、資源連結、人力資源管理、社區產業發展。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需求的重要性排列順序並不一致，這也顯示出社區幹部認為最需要培力的項目可能並不會被公所承辦人所認同，而公所承辦人認為社區應該加強輔導的能力項目對社區幹部而言可能並不重要，此一需求落差情形極有可能導致社區輔導成效不彰，或在社區輔導項目的優先順序上存在著認知差異。

若比較這兩類人員在這 8 個社區能力指標上的差異，可以發現這兩類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看法上有顯著的不同，社區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平均得分顯著較高，公所承辦人員在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上的平均得分顯著較高，顯示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指標看法上有不同的比重。取前四項需求來比較，有以下幾點發現：

1. 文書能力為共同的需求

文書能力是唯一雙方都共同認為重要的社區能力需求，它常被認為是影響提案動力的關鍵因素，尤其鄉村型社區常因為文書能力欠佳，在提案及簡報上遭遇挑戰（賴兩陽，2015），社區培力上常安排相關電腦課程及招募青年志工，即是假設增強社區文書能力即能提升社區能力，然根據研究發現，文書能力或許重要，但並非為公所承辦人類或社區幹部所重視的首要需求。

2.財務核銷能力為公所承辦人員所重視

公所最重視財務核銷能力，這或許立基「由上而下」視角，與公所需扮演資源守門人及身為基層官僚組織有關（孫煒，2020），此亦顯示社區在經費核銷上欠缺能力的困境（賴兩陽，2013），而財務核銷也是基層公務組織最關心的議題。不過在社區能力潛在構面建構上，公所承辦人員並未將這一指標納入，顯示其雖認為是很重要的指標項目，但卻不一定是必備的能力之一。

3.社區產業發展能力為社區幹部所重視

社區幹部最重視的是社區產業發展，立基「由下而上」視角，此與社區普遍想要發展在地特色產品、活絡在地經濟，以減少對政府的經費依賴有關（李易駿，2021），同時也回應因經費不足而無法自主發展的困境（李美珍、王燕琴，2016；謝政勳、邱鈺婷，2023）。

4.資源連結及方案計畫書撰寫能力為社區幹部所重視

社區幹部對資源連結及方案計畫書撰寫能力較為重視，這顯示社區幹部期待能藉著計畫書撰寫及資源連結獲得更多金錢、物資與人力，藉以提升社區可運用的資本，這與發展產業來活絡在地有異曲同工之妙。

5.在地組織協調能力為公所承辦人員所重視

公所承辦人員關心社區組織的在地串連、溝通與協商，此突顯其身為地方父母官的角色，重視在地組織之間的橫向連繫及協力，而非僅是上下之間的縱向關係。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社區幹部（由下而上）較強調社區組織資源、經費的拓展，因為方案計畫書撰寫有助於申請經費補助、社區產業發展可以增加社區財務的挹助、資源連結則有利於社區方案的推動，這與李美珍和王燕琴(2016)、王潔媛(2019)的看法相同。但從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的角度來看，健全社區組織、凝聚社區成員的共識、加強行政文書及核銷作業能力則更為重要，

其認為只有社區組織具備了基本的行政作業和運作能力，其在方案推動或產業發展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此與黃松林和黃怡慧（2015）、賴兩陽（2015）的研究有相同的發現。雖然過去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詢問其對社區能力的看法，而本研究則是針對同一個社區組織不同立場人員來分析其對社區能力的需求程度，但本研究的結果更能突顯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看法上的差異，這也提醒我們在進行社區輔導工作時，應注意社區所期待的協助內容可能和輔導團隊能提供的項目之間存在落差，因而如何取得最大的共識將是社區輔導成敗的關鍵。

（二）建構出社區能力潛在構面的啟示

就社區能力的組成來看，社區幹部及公所承辦人員在看法上有顯著差異，社區幹部認為社區能力的組成主要包括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等 6 個要素；而公所承辦人員認為社區能力應由社區意識凝結、文書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這 5 個要素組成，兩者共通的要素包括社區意識凝結、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等指標，但在社區意識凝結、資源連結能力上，兩類人員卻是存在顯著的差異（見表 2）。過去研究中，Hockings et al.（2000）、黃肇新等人（2009）、許雅惠（2011）、李易駿（2021）認為社區意識是健全社區組織的首要因素，Glickman and Servon（1998）、Laverack and Labonte（2000）、Kim et al.（2020）強調社區發展過程中資源連結是十分重要的，Weil（1996）、Hargreaves et al.（2017）、Walters（2021）認為與在地組織合作及建立夥伴或聯盟關係是非常重要的，Slavin et al.（2013）、Lee and Clerkin（2017）、Wells et al.（2020）、Walters（2021）、黃源協和莊俐昕（2020）也認為社區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和協調是社區能力建構不可忽略的工作，本研究結果都顯示不論是由下而上（社區幹部）或由上而下（公所承辦人）的觀點，不同學者對於社

區能力的組成與看法在本研究中均獲得驗證，然而須注意的是，這兩類不同人員在社區意識凝結和資源連結指標上的平均得分達顯著差異，社區意識凝結上公所承辦人員的平均得分較高，但在資源連結上則是社區幹部的平均得分較高，顯示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建構雖有共同的指標，但組成的內涵實則並不相同，需求程度的優先順序也不一樣。

除此之外，不同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組成仍有相異之處，社區幹部認為社區能力應再包含方案計畫書撰寫和社區產業發展，但公所承辦人員則認為社區能力應包含財務核銷能力，前者認為應如何爭取更多的補助、拓展社區收益，後者則認為社區應先培養文書行政和經費核銷能力，顯示由下而上的觀點認為應拓展社區財務來源，但由上而下的觀點則認為應先健全社區組織的運作能力。

最後，我們透過統計分析將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來的「社區能力」做比較，結果發現雖然同樣都是「社區能力」的概念，但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來的整體概念實則不同，而且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由此可見，不同的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看法上，無論是在組成要素上或是整體概念上其實是有差別的，因而在進行社區輔導工作時應先瞭解不同人員對社區能力需求的看法，並取得最大的共識，如此方有助於社區能力的提升。

伍、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從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兩類不同人員的觀點，分析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看法，並試圖建構出這兩類人員對於社區能力的概念模型，依據前述分析結果，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和建議：

一、社區培力應理解彼此的差異並取得共識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在方案計畫書撰寫、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這 5 個指標上有顯著差異：社區幹部在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公所承辦人員，但公所承辦人員在財務核銷、社區意識凝結上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社區幹部。由此可知，這兩類人員對於不同的指標在比重上並不相同，顯見社區幹部較在意的是外在資源的導入，包括社區如何有更好的產業發展、如何獲得較多的資源或是創造更多的收入，但公所承辦人員卻更重視社區組織內部的經營管理和資源連結能力，包括社區意識的凝聚、財務核銷及資源連結能力，這些源自於角色立場不同，理解差異成因有助於避免衝突及成見，創造更有效的溝通及對話，且能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

二、社區能力建構應兼顧社區內部與外部的需求

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式所建構出的兩個社區能力模型中，社區幹部所建構的「社區能力」是由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意識凝結、社區產業發展、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能力所組成，而公所承辦人員所建構的「社區能力」則是由社區意識凝結、文書行政能力、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在地組織協調能力所組成。由此可知，社區幹部和公所承辦人員所認知的社區能力在組成要素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這兩者在社區意識凝結、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連結能力、在地組織協調能力的指標上相同，但其需求重要性排列順序卻有所差異。透過模型恆等性檢驗也發現，這兩類人員所建構出的社區能力潛在構面並不恆等，顯示同樣是社區能力，但這兩類不同人員卻有不同的關切重點，

而「財務核銷能力」都不被這兩類人員列入社區能力指標當中，顯示他們認為經費核銷並不是社區能力重要的組成要素。整體而言，社區幹部（由下而上）較強調方案計畫書撰寫、社區產業發展、資源連結能力，這都是比較偏向社區外部資源導入和財源的拓展，而公所承辦人員（由上而下）則較重視社區意識的凝結、在地組織協調與文書行政能力，這則是較偏重於社區內部運作和行政能力的培養，此一研究結果再次提醒我們在進行社區培力工作時，應注意不同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和期待並不相同，社區培力設計應呼應在地需求，深入探勘社區組織之實際想法，發展出具異質性的內容，以回應不同現況的社區組織需求。

三、社區政策規劃與推動應考慮在地需求及特性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提及，主管單位應「輔導」社區發展協會，輔導具有教導或指導的意涵，「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重視社區自主性與主體性，強調培力社區組織來滿足在地需求。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社區組織及社區幹部對社區能力指標的優先順序排列上有明顯不同，但臺灣目前的社區工作在推動上仍強調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執行，但中央所制訂的政策是否符合地方的期待與需求則有待商榷。就中央政府而言，區公所為下級單位，對社區組織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皆是其上級主管單位，區公所夾在兩者當中雖能理解在地社區的需求，但卻無能為力。換言之，在政治權力位階差異下，政策制訂單位需進一步省思其權力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否則上級公告之社區政策框架及補助辦法可能會抑制社區的主體性，社區組織成為政府組織政策延伸的廉價工具，為了取得政府補助經費而忽視在地需求，產出罐頭式服務，久而久之之過度依賴政府資源就會喪失社區自主能力。換言之，社區政策應

基於尊重及平等立場，保有彈性空間及因地制宜，並允許在地組織由下而上進行社區服務推展。

四、社區發展應在取得彼此共識前提下進行

本研究發現，同樣是「社區能力」這個名詞，但社區幹部的理解和公所承辦人員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由於對社區能力不同的解讀方式代表著期待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因而在進行社區輔導時，應先釐清彼此的認知與想法，無論是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社區培力，我們認為沒有唯一的社區輔導模式，只有在彼此都有共識的情況下進行社區培力，才能讓社區得到真正的幫助和進步。

社區發展協會是臺灣民主演進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組織，而且社區發展協會在現今社會中扮演著弱勢關懷與社區居民連結的重要角色，雖然過去許多學者對社區能力的建構有不同的分類方式和組成內涵，但透過本研究我們發現立場與角色的不同，對於社區能力的看法也有所差異。社區發展協會通常是一個複雜的組合體，其中涉及到人員、金錢、組織及制度各個不同的層面，政府在扶植社區組織的時候究竟應採用由下而上的觀點，讓其適性發展、各取所需，還是要透過由上而下的做法，統一指揮管理、培養共同能力，這當中存在許多的爭議。若是任由社區由下而上滿足其個別的需求，則無法有效統一管理和提升效率與效能；若是由上而下的進行扶植和培力，則可能扼殺了社區的特殊性和多樣化發展。在社區能力的培力過程中我們或許無法得到唯一的解答，但透過本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立場對於社區能力的需求會有不一樣的解讀和期待，無論是站在政府部門或是民間單位的立場，都應該瞭解彼此在社區能力的想法與期待是不同的，或許我們應該針對社區本身的特質，客觀的去評

估其問題和需求後，在取得雙方共識的情況下針對社區能力進行輔導和協助，如此方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經營發展。

參考文獻

- 王潔媛 (2019)。〈運用社區資本與行動促進老人心理健康〉。《輔仁社會研究》，9，109-150。(Wang Chieh-Yuan (2019). Improving Older Adults' Mental Health by Using Community Capital and Action. *Fu Jen Social Studies*, 9, 109-150.)
- 吳明儒 (2009)。〈社區發展的新視野：歐洲國家經驗的學習〉。《臺灣社會福利學刊》，8(1)，29-69。(Wu Ming-Ju (2009). A New Vis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Europe's Experienc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8(1), 29-69.)
- 吳明儒 (2013)。〈弱勢社區培力與輔導機制之探索性研究－三種 CSW 模式之分析〉。《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3(3)，1-57。(Wu Ming-Ju (201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mpowerment Mechanisms for Vulnerable Communities-Three Kinds of CSW Mode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3(3), 1-57.)
- 吳明儒、王仕圖 (2009)。〈區公所培力社區的創新方案及其成效之研究：以高雄市「協力各區開啓社區願景實施及續力計畫」為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3(2)，113-132。(Wu, Ming-Ju and Shih-Tu Wang (2009). A Study 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by District Offices: A Case Study of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Vis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Project" in Kaohsiung C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3(2), 113-132.)

- 吳偉寧、謝政勳（2018）。〈自主防災社區運作之經驗分析－高雄市永安區個案探討〉。《公共事務評論》，17（1），89-105。（Wu, Wei-Ning and Cheng-Hsun Hsieh (2018). Lessons Learnt from a 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Yongan District of Kaohsiung City.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Review*, 17(1), 89-105.）
- 紀和均（2021）。〈地方自治下的「區」與「村里」組織〉。《中國地方自治》，74（8），3-42。（Chi, Ho-Chun (2021).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f “Districts” and “Villages” under Local Self-Government.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74(8), 3-42.）
- 呂詩婷、李固遠、謝奇明、蘇宜成、蔡必焜（2018）。〈農村再生社區執行問題與社區能力之分析研究〉。《農林學報》，66（2），95-105。（Lu Shih-Ting, Ku-Yuan Lee, Chi-Ming Hsieh, Yi-Chen Su and Bi-Kun Tsai (2018). The Stud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blem and Community Capacity in Rural Regeneration Program.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6(2), 95-105.）
- 李易駿（2021）。《當代社區工作：計畫與發展實務》。臺北：雙葉書廊。（Lee Yih-Jiunn (2021). *Contemporary Community Work: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Taipei: Yeh Yeh.）
- 李易駿、賴兩陽（2014）。《社區組織參與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後續發展之研究》。臺北：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研究。（Lee, Yi-Chun and Liang-Yang Lai (2014). *A Study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Welfare Community Flagship Program*. Research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Welfare Lottery Fund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李易駿、鍾武中（2022）。〈我國社區培力中心運作類型之分析：社區能力建構觀點〉。《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6（2），1-53。（Lee Yih-Jiunn and Wu-Chung Chung (2022).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Centers in Taiwan.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26(2), 1-53.）
- 李美珍、王琴燕（2016）。〈跨越半世紀－社區發展 5.0〉。《社區發展季刊》，154，6-17。（Li Mei-Zhen and Qin-Yan Wang (2016). Over Half a Century: Community Development 5.0. *Community Development Quarterly*, 154, 6-17.）
- 李茂能（2006）。《結構方程模式軟體 Amos 之簡介及其在測驗編製上之應用》。臺北：心理。（Li Mao-Neng (2006).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oftware Amo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est Compilation*. Taipei: Psychology Press.）
- 李琪明（2020）。〈多面向道德情意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教育心理學報》，51（4），561-583。（Lee Chi-Ming (2020). Multidimensional Affective Moral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valua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1(4), 561-583.）
- 林勝義（1999）。〈從社區評鑑論臺灣社區發展未來的行動〉。《社會福利》，141，40-44。（Lin Sheng-Yi (1999). Discussion on Taiwan's Future Action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from Community Evaluation. *Social Welfare*, 141, 40-44.）
- 姜淳方、李昀修（2012）。〈臺灣連鎖速食餐廳屬性、享樂及功利價值、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臺灣 Y 世代消費者為例〉。《行銷科學學報》，8（1），77-95。（Chiang Chun-Fang and Yun-Shiou Li (2012). A Study of Relationships among Fast-Food Chain Restaurant Attributes, Utilitarian and Hedonic Valu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Y-Generation Consumers. *Taiwan Journal of Marketing Science*, 8(1), 77-95.)

孫煒 (2020)。〈臺灣地方基層官僚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治理模式：桃園市案例研究〉。《政治科學論叢》，85，139-177。(Sun, Wei (2020). Governance Models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moted by Local Grassroots Bureaucrat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aoyuan C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5, 139-177.)

張偉豪 (2011)。《SEM 論文寫作不求人》。高雄：三星統計。(Chang Wei-Hao (2011). *SEM Essay Writing does not Ask for Help*. Kaohsiung: Samsung Statistics.)

張偉豪、鄭時宜 (2012)。《與結構方程式共舞：曙光初現》。新北：前程文化。(Chang Wei-Hao and Shi-Yi Zheng (2016). *Dancing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s: The First Light*. New Taipei: FCMC.)

梁大慶 (2016)。〈社區組織運作能力與發展之研究－以雲林縣社區組織參與農村再生過程為例〉。《農民組織學刊》，20，35-70。(Lian Ta-Ching (2016).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Case on Rural of Yunlin. *Journal of Farmer Organizations*, 20, 35-70.)

梁大慶 (2017)。〈以結構方程式探討農村社區組織能力與發展面向之模式：以雲林縣農村再生發展進程為例〉。《鄉村旅遊研究》，10 (1)，41-61。(Liang Ta-Ching (2017). Explored the Model of 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argets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a Sample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Yunlin. *Journal of Rural Tourism Research*, 10(1), 41-61.)

- 梁世安、余國璋（2005）。〈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二輪式電動代步車消費者接受程度〉。《行銷評論》，2（2），135-148。（Liang Shih-An and Kao-Wei Yu (2005). Us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Explore User Acceptance of Two-wheel Electric Scooter. *Marketing Review*, 2(2), 135-148.）
- 葉明勳、劉坤億（2012）。〈五都新制下區公所法定定位與治理職能之研析〉。《文官制度》，4（2），93-127。（Yeh, Ming-Hsun and Kun-Yi Liu (2012). Analyzing the Positioning and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District Offices under the “Five Municipalities” New System.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4(2), 93-127.）
- 許雅惠（2011）。〈社區能力與社區工作者關鍵能力：成人學習觀點的分析〉。《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1），91-135。（Hsu Ya-Huei (2011). Community Capacity and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Community Workers: Adult Learning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1(1), 91-135.）
- 陳巧倫（2019）。〈社區大學社團成員公共參與及社區能力建構之研究：以阿金文創社團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24，123-148。（Chen Chiao-Lun (2019). Community College Club Membe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Aj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lub. *Journa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y*, 24, 123-148.）
- 陶蕃瀛（1994）。《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實務》。臺北：五南。（Tao Fan-Ying (1994).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actice*. Taipei: Wu-Nan.）
- 游錦雲、李思賢、李蘭、陳玉佩（2009）。〈兒童內化行為問題測量工具的建立及其信效度研究〉。《測驗學刊》，56（3），295-319。（Yul Ching-Yun,

- Szu-Hsien Lee, Lan Lee and Yu-Pei Chen (2009).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Scale: A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Psychological Testing*, 56(3), 295-319.)
- 黃志隆 (2020)。〈S 村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初級照顧實踐：共同事務治理與準市場架構之計畫行政的對話〉。《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0 (1)，109-159。 (Huang Chih-Lung (2020). The Practice of Primary Care in S Community Association, Jiuru Village, Pingtung County: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Governing of Commons an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of Quasi-Market.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10(1), 109-159.)
- 黃松林、黃怡慧 (2015)。〈社區發展組織韌性與需求相關研究：以高雄市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6，22-66。 (Huang Song-Lin and Yi-Hui Huang (2015). A Research on Staff Resilience and Need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ases Study in Kaohsiung City. *Journa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y*, 16, 22-66.)
- 黃珮玲 (2021)。〈計畫內容篇〉。賴兩陽 (主編)，《福利社區劃旗艦型計畫實務操作手冊》，頁 51-90。臺北：衛生福利部。 (Huang Pei-Ling (2020). Plan Content. In Leang-yang Lai (Eds.), *Welfare Community Program Flagship Program Practical Operation Manual* (pp. 51-90). Taipe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黃源協、莊俐昕 (2020)。《社會工作管理 (四版)》。臺北：雙葉書廊。 (Hwang Yuan-Shie and Li-Hsin Chuang (2020). *Social Work Management (Fourth Eds.)*. Taipei: Yeh Yeh Book Gallery.)
- 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 (2015)。〈社區能力與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對社區治理能力與社區發展的意涵〉。《公共行政學報》，49，1-36。 (Hwang

Yuan-Shie, Li-Hsin Chuang and Su-Jen Liu (2015). A Study on Community Capacity and Community Life Qualit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9, 1-36.)

黃肇新、邱靖媛、朱洪漢（2009）。《社區整備程度模式：成功轉變社區的指引》。高雄：巨流。（Huang Zhao-Xin, Jing-Yuan Qiu and Hong-Han Zhu (2009). *The Community Readiness Model: A Guide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ing Communities*. Kaohsiung: Chu-Liu.）

劉素珍（2013）。《本土化社區能力量表之建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Liu Su-Jen (2013). *Constructing a Native Scale for Community Capac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antou.）

蔡吉源（1995）。〈論臺灣地區社會資本、社區意識與社區社會之重建〉。《臺灣經濟》，228，1-12。（Tsai Chi-Yuan (1995). On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ociety in Taiwan. *Taiwan Economy*, 228, 1-12.）

衛生福利部（2021）。《社區培力中心實務操作手冊》。臺北：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Community Empowerment Center Practical Operation Manual*. Taipe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22）。《110年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成果》。資料檢索日期 2023 年 3 月 9 日。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55-67956-103.html>。（Depart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Work,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2).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2021. Retrieved 09-03-2023, from <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55-67956-103.html>.)

賴兩陽(2013)。〈初生之犢不怕虎？一個花蓮新成立社區的培力與輔導歷程〉。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3(3)，159-196。(Lai Leang-Yang (2013). Empowered and Counseled Process at a Newly Established Community in Hualien.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3(3), 159-196.)

賴兩陽(2015)。〈陪伴與培力：與花蓮市聯合社區共學的過程〉。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5(1)，85-127。(Lai Leang-Yang (2015). Accompany and Empowerment: The Process of Co-Learning with Collaborative Communities in Hualien C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5(1), 85-127.)

賴兩陽(2020)。〈組織社區〉。見林萬億(編)，《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

工作》，113-131。臺北：雙葉書廊。(Lai Leang-Yang (2020). Organize Community. In Lin Wan-I (Ed.), *Community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Yeh Yeh.)

賴兩陽(2021)。〈政府介入 vs. 社區自主：台灣社區發展工作的根本議題〉。

《國家與社會》，22，71-91。(Lai, Liang-Yang (2021).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vs. Community Autonomy: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Taiwa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 *National and Social*, 22, 71-91.)

謝政勳、邱鈺婷(2023)。〈參與在虛實之間？解析公民參與在基層官僚設計

推動下的真實樣貌〉。《中國行政評論》，29(3)，86-118。(Hsieh, Cheng-Hsun and Yu-Ting Chiu (2023). Analyzing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face of Reality and Virtuality: The Realities Shaped by Grassroots Bureaucratic Design.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3), 86-118.)

- 顏弘欽 (2013)。〈個人－工作適配理論的實證分析：以國小教師為例〉。《嘉大教育研究學刊》，31，59-83。 (Yen Hung-Chin (2017). An Empirical Study on Person-Job Fit Theory: A Exampl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hiayi University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1, 59-83.)
- Andersson, F. O., L. Faulk and A. J. Stewart (2016). Toward More Targeted Capacity Building: Diagnosing Capacity Needs Across Organizational Life Stag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7, 2860-2888.
- Austin, M. J., K. Regan, M. W. Samples, S. L. Schwartz and S. Carnochan (2011). Building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in Nonprofit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rough 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35(3), 258-281.
- Blumenthal, B. (2003). *Investing in Capacity Building: A Guide to High-impact Approaches*. NY: Foundation Center.
- Bowen, G. L., J. A. Martin, J. A. Mancini and J. P. Nelson (2000). Community Capacity: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8(2), 1-21.
- Bush, R., J. Dower and A. Mutch (2002). *Community Capacity index: Version 2. Centre for Primary Health Care*. Brisbane: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Cameron, J., B. Wenger-Trayner, E. Wenger-Trayner, A. Hart, L. Buttery, E. Kourkoutas...and A. Rathbone (2018). *Community-university Partnership Research Retreats: A Productive Force for Developing Communities of Research Practice*. In *Co-producing Research* (69-92). Bristol: Policy Press.

- Chaskin, R. J. (2001).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 *Urban Affairs Review*, 36(3), 291-323.
- Chaskin, R., P. Brown, S. Venkatesh, A. Vidal and R. Chaskin (2001). Community Capacity and Capacity Building: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1, 7-26.
- Dragow, F. (1987). Study of the Measurement Bias of Two Standardized Psychological Tes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2(1), 19-29.
- Eisinger, P. (2002).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mong Street-level food Assistance Program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1(1), 115-130.
- Fornell, C. and D. F. Larcker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 Glickman, N. J. and L. J. Servon (1998). More than Bricks and Sticks: Five Componen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apacity. *Housing Policy Debate*, 9(3), 497-539.
- Green, G. P. and A. Haines (2015). *Asset Building & Community Development*. NY: Sage Publications.
- Hargreaves, M. B., N. Verbitsky-Savitz, B. Coffee-Borden, L. Perreras, C. R. White, P. J. Pecora... and K. Adams (2017). Advancing the Measurement of Collective Community Capacity to Addres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Resilienc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76, 142-153.

- Harrison, R., C. Blickem, J. Lamb, S. Kirk and I. Vassilev (2019).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Narratives, Practice, and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Community Practitioners. *SAGE Open*, 9(1), 1-11.
- Henry, J. W. and R. W. Stone (1994).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End-user Satisfaction with a Computer-based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IRMJ)*, 7(3), 21-33.
- Hockings, M., S. Stolton and N. Dudley (2000).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No. 6)*. Gland: IUCN.
- Horn, J. L. and J. J. McArdle (1992). A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e to Measurement Invariance in Aging Research.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18(3), 117-144.
- Hu, L. T. and P. M. Bentler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 Hulland, J. (1999). Us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Four Recent Stud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 195-204.
- Israel, B. A., A. J. Schulz, E. A. Parker and A. B. Becker (2001).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a Partnership Approach in Health Research. *Education for Health*, 14(2), 182-197.
- Itzhaky, H. and E. Bustin (2018). Community Practice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Handbook of Community Movements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245-263.

- Jöreskog, K. G. and D. Sörbom (1993). *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Lincolnwood: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 Kim, J., H. Lee, E. Cho, K. H. Lee, C. G. Park and B. H. Cho (2020). Multilevel Effects of Community Capacity on Active Aging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South Korea. *Asian Nursing Research*, 14(1), 36-43.
- Kretzmann, J. and J. McKnight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Laverack, G. (2006). Evaluating Community Capacity: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3), 266-276.
- Laverack, G. and R. Labonte (2000). A Planning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Goals within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5(3), 255-262.
- Lee, C. and R. M. Clerkin (2017). Exploring the Use of Outcome Measures in Human Service Nonprofits: Combining Agency,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Perspectives.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40(3), 601-624.
- Marsh, H. W. and K. T. Hau (1996). Assessing Goodness of Fit: Is Parsimony Always Desirable?.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64(4), 364-390.
- Mayer, S. E. (1994).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The Potential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MN: Rainbow Research.
- McDonald, R. P. and M. H. R. Ho (200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Repor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1), 64-82.

- Minkler, M. (2005).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Partnership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82, ii3-ii12.
- Ross, M. G. and B. W. Lippin (1955).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inciples* (No. HV40 R68). New York: Harper.
- Rubin, H. J. and I. Rubin (1992).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Boston: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 Schumacker, R. E. and R. G. Lomax (2004).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Jersey: Psychology Press.
- Simmons, A., R. C. Reynolds and B. Swinburn (2011). Defining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is it Possible?. *Preventive Medicine*, 52(3-4), 193-199.
- Slavin, S., P. Terry Mizrahi and J. D. Morrison (2013).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Advances, Trends, and Emerging Principles*. NY: Routledge.
- Sun, R. and H. D. Asencio (2019). Using Social Media to Increase Nonprofit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2(5), 392-404.
- Walters, J. E. (2021).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Nonprofits in the Poor, Rural South.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86, 497-507.
- Weil, M. O. (1996). Community Building: Building Community Practice. *Social Work*, 41(5), 481-499.
- Wells, K. B., F. Jones and K. C. Norris (2020). Applying Community-partner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pproaches to Develop COVID-19 Solutions. *Ethnicity & Disease*, 30(3), 433-436.